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丛书 主编 程恩富 马艳 冯金华

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 关系新探

程恩富 马艳 孟捷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新探/程恩富,马艳,孟捷等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12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丛书)

ISBN 978-7-5642-1222-3/F·1222

I. ①劳… II. ①程… ②马… ③孟… III. ①劳动生产率-关系-价值-研究 IV. ①F242②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630 号

- ☐ 责任编辑 刘光本
- ☐ 封面设计 钱宇辰
- ☐ 责任校对 王从远 赵伟
- ☐ 责编电邮 lgb55@126.com
- ☐ 责编电话 021-65904890

LAODONG SHENGCHANLÜ YU JIAZHILIANG GUANXI XINTAN

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新探

程恩富 马艳 孟捷 等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竟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90mm×1240mm 1/32 7.25 印张 201 千字

定价:28.00 元

丛书总序

程恩富 马 艳

重视数学分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定量分析,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资本论》就是一个典范。可以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运用数学最多的就是马克思。“马克思使用的计算,主要是用作文字论证的补充说明,他的文字论证将过程和横断面分析结合在一起了,这样的计算即使对今天现有的数学技巧来说,也是做不到的。”^①马克思曾说:“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有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检验的材料,这是可能的)。”^②马克思重视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但并不迷信数学,而是始终将数学方法建立在正确的分析前提上,即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坚持以科学抽象法、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作为分析的基础。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在纯数学领域内进行的研究,必须通过经济分析进行检查,使它不脱离某一经济现象所固有的经济规律。由于坚持了上述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化分析能够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科学性。

相比之下,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工具,但由于其出发点时常失误或脱离现实,因而其数学化的结果并不能表明其理论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例如,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计量经

^① 肯尼思·梅(K. May):《价值和价格:对温德尼茨解法的一个注释》,载《经济学杂志》1948年第6期,第5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济学模型的联立方程组中,通常必有一个方程是按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的原则设立的,从而用这样的数学模型求解出来的结果必定与生产过剩等常见实情相距甚远,从而无法发现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也无法预测经济危机。另外,数学模型的复杂性并不与数学模型的科学性成正比。比如,西方宏观经济学模型为了体现自己的科学程度,喜欢搞上百个方程和上百个变量的过于复杂的大型模型,却忽略了每个变量都存在计量误差。随着方程数和变量数的增加,每个变量的些许误差的集合会放大成巨大的误差,从而使模型只有纸面上的意义,难以科学认知和应用。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对于数学工具的运用是不充分的。马克思曾经讽刺李嘉图:“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①与此类似,“令所谓的利润函数一阶导数等于零是西方经济学家所知道的唯一的求解利润最大化的方法”^②。一方面,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求解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另一方面,考虑到风险的存在,资本家也并不处处追逐短期利润的最大化。显然,不受西方经济学束缚的政治经济学可以更合理地使用更多的数学方法。

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派经济学》,以及由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团队编写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100万字完整版、60万字通用版和30万字简明版)、《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100万字完整版、60万字通用版)、《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100万字完整版、60万字通用版)等,还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套《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研究系列丛书》,都表明了政治经济学数学化的良好发展前景和我们团队为此所作出的探索与耕耘。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研究系列丛书》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在坚持思想内容创新的基础上,使用数理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对当下学术界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热点经济问题进行论证、阐述和发展的一个有益尝试。这种尝试主要是沿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脚注。

② 余斌:《经济学的童话》,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如下三个层面和基本路径进行的：

第一个层面是内容创新：所谓的内容创新，就是提出一些新理论或新观点，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或新的理论体系的过程。这一研究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本系列丛书就是将内容创新和思想创新放在首要的位置，无论是在基础理论方面，诸如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价值转型理论、失业理论和地租理论等，还是现实经济问题，诸如国际交换和国际贸易问题，房地产和虚拟资本市场问题，网络经济和信息与传媒经济问题，能源、环境与低碳经济问题等都有从理论体系框架到基本思想和观点多个方面的内容创新。

然而，创新的理论内容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经济学界经常使用的表达方法无非是文字分析和数理分析两种方法。文字分析方法就是用文字符号来描述经济现象，通过上下文的语句逻辑进行推理的一种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比较适合理论内容创新过程中的定性分析和研究，更高级的理论抽象与表达则是数理分析的优势所在。

第二个层面是数理分析：所谓的数理分析，是指利用数学符号以及几何学、矩阵代数、微积分、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等数学工具来描述经济问题，运用已知的数学定理通过推理过程得出一组结论或定理的一种经济学方法^①。

这种分析方法对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一方面使一些新思想、新观点的表达更加简洁，可以将很复杂的内容抽象成几个公式或几条曲线，另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新思想、新命题在“如果—那么”的严格假设条件下经过推理而更加严谨、更加精确。

为此，本系列丛书广泛地使用了现代数学工具，并针对不同的问题使用了不同的数学方法：运用导数、对数函数导数对价值理论以及结构性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等进行分析，在剩余价值等理论中

^① 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页。

还使用了最优化方法;运用矩阵代数的处理方法对价值转形理论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利用了矩阵代数中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等推理出来的结论具有重要价值;在剩余价值生产动态分析、动态价值转型模型、平均利润规律动态模型、两部类经济增长关系模型等中则使用差分方程分析了跨期之间的变量关系等。

第三个层面是实证分析:所谓实证分析,主要是利用计量分析技术,诸如运用估计和假设检验的统计学方法进行经验观测的分析方法^①。这一分析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任何理论的创新都必须从现实经济活动出发,是基于对现有经验数据和历史材料的整理分析和抽象才能得出的结论或命题,反过来任何一种新的理论也必须运用经验数据对其有效性进行检验,并在现实经济活动实践后才具有可运用性或证明其科学性。

为此,本系列丛书在剩余价值理论模型的劳资关系实证分析过程中使用了问卷调查方法,在网络经济虚拟性的实证分析过程中使用了案例分析方法;在平均利润率的动态模型中的实证分析、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实证分析、两部类经济增长关系模型实证分析过程中使用了最小二乘估计(OLS)回归方法、协整检验、平稳性检验等计量方法;在地租和房地产经济理论以及国际不平等交换等理论分析中使用了面板数据(Panel Data)回归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Test)、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等计量方法。

然而,本系列丛书沿着上述基本路径所进行的三个层面的理论创新并不是相互割裂或片面倾注,而是具有一定内在联系和理论逻辑的。

首先,本系列丛书遵循了内容创新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的原则。

思想内容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的首要任务,也是数理分析和计量分析的前提条件。本系列丛书在对马

① 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页。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大量使用现代数学的最新成果来表述与分析、演绎与推理其理论框架(数理模型),力图在数学逻辑的明晰假设基础上进行理论传承与创新,这是由于“恰当地运用数学方法,可以将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成果表达得更准确和精确,可以更好地检验结论和前提是否一致或矛盾,可以更有力度地增强研究成果中的结论。”^①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数理分析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经济思想,也不能创造任何经济学概念、理论和体系。因为“数学形式的正确,决不能证明经济理论的正确”,而创新理论内容正确则是数理分析的前提条件。吴易风教授曾生动地描述到:“在数学这个磨盘中,你放进小麦,可以磨出面粉;你放进草籽,就决不会磨出同样的东西。计算机科学家的‘废料进,废料出’的说法,生动地表明,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用了多少数学和多么复杂的数学,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②

可见,对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分析可以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高度重视利用数学分析工具,把数学分析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结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论证、阐述和发展,以弥补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不足。这里所说的数学化,并非数学化程度越深越好,而是要以理论内容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正确性为前提。第二种则是盲目地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接轨,注重数学分析的形式主义而滥用数学工具。为了数学而分析,而不是为了分析而运用数学,甚至为了便于参照西方经济学的方式运用数学,而采用西方经济学所使用的部分错误假设和前提,背离了在政治经济学里运用数学的初衷,得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前一种态度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攻方向之一,后一种态度则是需要避免的。本系列丛书在使用数理分析方法过程中就注意到这些问题:十分注重所研究的理论创新内容是否正确,“有没有陷入无用

^{①②} 吴易风:《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数学符号迷阵,有没有忽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①,也就是非常注重所创新的内容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的问题。

其次,本系列丛书坚守数理分析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必要手段和工具的原则。这是因为:

就技术性来看:(1)数理分析方法所使用的数学语言与文字语言相比更便于理论演绎推理,其表达也较为简练。(2)数理分析方法可以排除文字逻辑存在的假设不明晰的缺陷。(3)数理分析方法可以用数学定理来证明其推理的正确性。从这个方面讲,我们同意康德的“数学是人类理性的骄傲”的命题,马克思也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用逻辑的和历史的演绎方法推理得出科学的结论而构成的理论体系,所以从逻辑上讲,马克思的推理方法和“公理化”的数学方法是一致的,而且这种推理方法也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严密性。(4)数理分析方法通过数理逻辑分析将一些创新内容表达出来后所建立起来的数理模型也为计量工具的使用和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使得内容创新与实证分析之间有了一座桥梁。

就现代性来看,数理分析方法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是可以运用现代数学的最新成果,为逻辑分析、抽象分析和定性分析等方法提供支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更全面的阐述;二是可以运用数学工具,对现代社会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材料进行更科学的归纳、整理和分析,并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更为翔实的依据等;三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对现代市场现象进行数学解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对比,从而增强人们的理论辨别力;四是可以使理论更严谨和清晰,易于表达,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解释力和说服力。总之,数理分析方法将有利于弥补目前

① 吴易风:《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部分缺憾,大大促进其理论的传承和创新,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

同时,本系列丛书也十分注重所要使用的数理方法是不是必要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坚守只有在使用数学方法比不使用数学方法更利于阐述和分析问题时才使用^①而不是相反的原则。本系列丛书还坚持只有在所涉及的变量可量化、数据可以得到的情况下才使用数学方法^②。因为如果变量不可以量化,那么用数学方法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比用文字分析好,甚至更差,这种情况就不适于用数学方法。另外,如果数据得不到,即使用数学方法得出了某些结论,也无法检验和预测,那么使用数学方法就不能获得额外的好处。此外,本系列丛书坚持使用公理化的逻辑推理,表现为许多理论模型都是建立在公理化的逻辑推理和演绎基础上的,并通过“公理(或假设)、推理、结论、检验”这一过程保证其逻辑的严密性。

最后,本系列丛书坚持实证分析方法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过程中起到进一步验证理论以及更好地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用的原则。

实际上,无论是内容创新和数理分析都属于理论分析,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则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作用的,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过程的体现。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任务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推理演绎这一层面的创新上,而是要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活动。所以,历史性与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特征,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就是一门实践的历史科学。所以,实证分析也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性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又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背景条件。为此,本系列丛书在实证分析中,也贯穿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具体遵循以下原则:

① 胡伟清:《经济学运用数学的尺度》,《经济学家》2006年第2期,第11~16页。

② 胡伟清:《经济学运用数学的尺度》,《经济学家》2006年第2期,第12页。

(1)坚持实证模型设计和案例选取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性。在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设计以及案例选取上坚持从理论分析出发,紧扣理论创新内容与数理分析得出的结论,而不能仅仅对经济数量的表面关系进行描述,为了实证而实证。

(2)坚持数据来源遵循客观、科学的原则。实证分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运用一定的方法对现实经济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从而论证结论,并用于指导实践。因此,数据来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成为实证分析正确与否的关键因素。由于现实的情况总是比抽象理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复杂,所以,本系列丛书中的实证分析坚持以真实、客观的现实数据为依据,而不能为了得到所需结论而选择性地遴选数据,甚至伪造和修改数据。

(3)坚持综合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不仅包括现代计量经济方法,还包括投入产出分析法、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经验数据分析等分析方法。鉴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本系列丛书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力求运用多种方法,同时也特别注意各种方法在研究中的适用条件,而不是简单“拿来主义”。

序

程恩富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接替洪远朋教授在复旦大学开设《资本论》课程，经过几次教学，我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究竟是“成正比”还是“成反比”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里，一方面强调劳动生产率无论怎样提高，价值总量都不变，另一方面又认为复杂劳动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由于劳动复杂程度引起的，而我们又确认价值总量会变化，就明显出现了悖论。此后，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有思考，但是始终没有时间专门写文章，直到 1999 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的“海派经济学论坛：关于劳动价值论理论的专题讨论会”上，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会议上，马艳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和我的观点基本一致，会后我们合作撰写了《马克思“商品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一文，并发表在《学术月刊》2002 年第 10 期上。

这篇文章的主体思想虽然十分清晰，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仍然遇到了许多难点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这一篇文章里也很难完全说清楚，因此我们将一些有把握的观点先写了出来。

就这篇文章而言，我们主要对马克思“商品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认识：

第一，我们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引起，即劳动的主观因素（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劳动强度）和劳动客观因素（生产资料和自然条件）。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纯粹是由劳动客观条件变化引起的，而劳动主观条件没有变化，那么，商品价值量

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成反比”变化,这与经典理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叙述马克思的这一经典结论时,应该把“主观条件不变和客观条件变化”这一假设条件加上,这样才不至于引起逻辑上的混乱。

第二,如果我们假设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纯粹是因劳动主观条件变化引起的,而劳动客观条件没有变化,那么,我们很自然就得出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的结论。

第三,如果承认上面两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就是显而易见的,即在劳动主观条件和劳动客观条件都变动时,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变动方向就是不确定的。

论文发表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就写文章肯定了我们这篇文章,并在我们研究的基础上继续了这一研究。他认为这篇文章是对“成正比”问题做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的讨论。他指出,应该将“成正比”和“成反比”理解为由同一些原因带来的双重结果,而不是将其归于不同的原因。在后续的研究中,孟捷教授论证了“成正比”成立的两种情况,并将“成正比”理论从单个部门经济扩展到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的范围^①。

之后,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朱殊洋教授试图在我们研究的基础上用数学逻辑证明我们的观点,他发表文章《个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会使价值总量增加吗——程恩富、马艳框架下的分析》,讨论了个别劳动生产率与价值总量之间的关系。他运用我们的研究框架,分析了不同部门之间劳动时间的转化关系,论证了企业实现的价值总量不仅取决于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率,还取决于该企业所在部门的劳动生产率^②。

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张忠任教授也赞成我们的观点,通过提出“期差性”、“域差性”和“业差性”等概念,运用数学方法从微观和宏

① 孟捷:《技术创新与超额利润的来源——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研究》,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② 朱殊洋:《个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会使价值总量增加吗——程恩富、马艳框架下的分析》,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

观两个角度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研究。他指出,由于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以及不同部门的差异,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内涵也有所不同,即衡量价值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因此,他认为“成正比”与“成反比”的命题在一定条件下将会同时成立^①。

十年过去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学者的注意,围绕这一问题的文章也逐渐增多。为此,2010年12月,在孟捷教授和马艳教授的建议下,我们主办了“第四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研讨会”,专门围绕这一专题进行了集中研讨,并建议将主张“成正比”的学者联合起来著书立说,以深化这一研究,这样就有了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

在这里,我们这些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理论有了进一步探索的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系统地阐述出来。由于每个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不同,也就形成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不同学说。这一研究深化和丰富了对这一难题的探讨,以利于今后的继续探讨。

^① 张忠任:《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的微观法则和宏观特征》,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2期。

目 录

丛书总序	1
序	1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关于“成正比”的理论界定	1
第二节 “成正比”理论:一个简史	7
第三节 “成正比”:2010 交锋	22
第二章 命题 1:主观条件说	30
第一节 引言	30
第二节 一个悖论	32
第三节 新假定条件下的理论模型	36
第四节 另一种状态的理论体系	40
第五节 一个实证分析	47
第三章 命题 2:正和说	5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51
第二节 暗默知识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54
第三节 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	57
第四章 命题 3:有用劳动说	68
第一节 研究前提	68
第二节 有用劳动与“成正比”	77
第三节 对劳动二重性的误解及其解释	83
第四节 关于生产要素作用的误区以及区分	89

第五节 关于使用数学的误区以及原则	92
第五章 命题 4:期差说	95
第一节 一个评析	95
第二节 商品价值的“期差性”、“域差性”以及几个相关问题	99
第三节 新认识	109
第四节 结论	118
第六章 命题 5:关系说	121
第一节 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三种变动关系 ..	121
第二节 客观条件引起的劳动生产率变化与商品价值量关系	128
第三节 主观条件引起的劳动生产率变化与商品价值量关系	131
第四节 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短期变动关系	135
第五节 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长期变动关系	141
附录	148
略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	148
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	155
试论价值的测量和精神生产对价值量的影响	167
也谈价值的测量——与叶航同志商榷	181
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变化关系分析	193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问题的探讨	201
后记	213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关于“成正比”的理论界定

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性研究或者理论分歧的讨论都需要一定条件的支持,否则,其研究就没有出发点,其争论就没有可沟通性平台。诸如我国学术界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变动关系的论争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迄今为止如果我们说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一点实际性的进展,还是得益于其研究方法 with 理念的某些统一性,以及研究背景的相对一致性。基于此,为了深化这一研究内容,以期取得更具有实际性进展的成果,本节拟对这一命题的相关内容进行理论界定。

一、关于“成反比”的理论界定

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反向变动关系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命题从量的方面揭示了劳动价值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一命题表述为:“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①

然而,马克思这一经典命题是建立在若干约束条件之上的:
首先是关于劳动生产率的限定:

(1)马克思在这一命题中对于劳动生产率是有严格限定的,即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劳动生产率。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率有个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 页。

别与社会之分:个别劳动生产率是生产某种商品的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社会劳动生产率则是生产某种商品的大多数企业所能达到的劳动生产率,一般用部门内部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加权平均数来表示。由于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不能比较的,这样由使用价值反映的具体劳动的效率也就不能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比较,因此,不存在一个在部门之外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即部门就是社会。

(2)马克思这一命题假定劳动生产率是具体劳动的效率,它影响使用价值量的变动。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化的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劳动的客观因素,二是劳动的主观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其描述为五个方面:“劳动的生产力,是由许多事情决定的,其中有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各种自然状况。”^①显然,这里的劳动复杂程度、熟练程度以及劳动强度等条件是劳动的主观因素,而生产资料、自然等条件则是劳动的客观因素。

其次是关于商品价值量的限定:

(1)商品的价值量是由抽象劳动决定的,最终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这里,商品价值量分为个别价值量、社会必要价值量和价值总量三个层面。个别价值量是部门内部个别企业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价值量则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②。它一般也是用部门内部企业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个别劳动时间的加权平均数来表示,而商品价值总量则是商品价值个量的加总求和。

(2)马克思还假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商品价值量没有直接影响。他指出:“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价值的劳动——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